目　　录

关于俞作柏、李明瑞政权的性质及李明瑞与
党的关系的一些问题
——对《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执政始末与
我党的关系》一文的意见……陈大文（1）
民主革命时期右江群众武装的建立和发展……谢乃松（24）

1924年陆荣廷、沈鸿英桂柳之战……黄宗炎（48）
陆福祥部那马被歼记……冯　瑞（68）
陆荣廷当政时期的财政金融方针……黄河清（73）
陆荣廷的"假护法"……周　雯（76）
陆荣廷拒绝韦绍皋就任广西民政长
——《广西大事记要》正误一则……梁万柱（79）
新旧桂系政权递嬗史……梁上燕（81）
1912年广西省会迁邕始末……梁新莲（92）
郭春田为抽鸦片烟税当替罪羊的内幕……周克邦（96）
桂系第七军在上海会战前后与徐州撤退……杨赞模（98）
抗日战争桂南战役前后……李如杰（102）
武鸣民众抗日义勇联队……韦　彦（106）
别动军挺进第三纵队在南宁……雷　德（108）

雷殷先生传略……杨　培、方孙振（112）

南宁早期的几间工厂……激　流（116）
解放前的南宁搬运业……黄方东、曾依维（11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48年南宁理发业的罢工斗争……曹依维（122）
王春晖发家史……李启祥、谭　津（126）

记斑峰书院、小学、中学办学事迹
……杨　培、玉其煌、梁大鹏（139）
抗战中的南宁护士学校……曾贵平（143）
忆武鸣地委干部学校……安金城（147）
抗日时期的南宁粤华剧团……苏保权（149）
从艺六十载，四度入广西
……谢醒伯初稿、黄鹤鸣整理（151）
舞台师姐妹　艺苑两知音
——记粤剧演员朱剑秋与花弄影
……谢醒伯初稿、殷璧整理（159）

南宁的鱼场和养鱼……滕肇文（161）

孙中山的南宁之行拾遗之一……巫永辉、方孙振（164）
孙中山的南宁之行拾遗之二……杨月凤（167）

更正一则……（47）

关于俞作柏、李明瑞政权的性质及李明瑞与党关系的一些问题

——对《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执政始末与我党的关系》一文的意见

陈 大 文

刘胜同志发表于1986年6月出版的《南宁党史资料》第十五期的《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执政始末与我党的关系》（以下简称《关系》）一文，叙述了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执政的经过以及他们与党的关系，是一篇很重要的党史资料，但我觉得其中有些资料和论断，还须加以辨别和商榷。

第一，俞李政府的性质问题

《关系》一文说，俞、李政府的班子是个大杂烩，省政府委员中有蒋介石的代表，有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观察员，有汪精卫改组派的代表。在军事将领中，文章说："吕焕炎原是黄绍竑所属的旅长，是李、黄、白旧势力的封建代表的领袖，割据桂东南。在吕焕炎的旗帜下，农村政府仍由豪绅把持，团总乡董的权力非常大，他们勾结官吏，剥削农民。另外，李明瑞、杨腾辉也图谋割据桂林、柳州。"因而断定"俞、李政府是各派势力争夺，小军阀割据的极不稳定的政府。"这样说来，俞、李政府，在本质上，和其他各省

的军阀割据的政府一样，都是封建军阀的统治了。而这个政府的首脑俞作柏、李明瑞也属军阀之列了。这样的论断，会导致对俞、李政府的性质及对俞、李本人的认识的误解和混乱。

我们不能把旧军队出身的拥有军队、占有地盘的人都说成军阀。这只是军阀必备的条件。军阀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镇压群众的反抗斗争，他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敌人，这是军阀一词的概念。判断一个政府或一个政权是不是军阀割据的政府或政权，主要是看它贯彻的政策和措施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如果它贯彻的政策和措施是反共反人民的，那掌握兵权割地称雄的人，肯定是反动军阀，他所主持的政府或政权，肯定是军阀割据的政权。如1927年的武汉国民政府，当它还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时候，它是革命政府，但当汪精卫分共、反共，背弃三大政策的时候，它就成为反革命的政府了。支持汪精卫的唐生智也就由革命军人变为新的军阀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成了新的军阀。他们实施白色恐怖，残酷地压榨人民，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野蛮地镇压和围剿起义的农民队伍。只有俞作柏、李明瑞主持的广西省政府，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俞、李在广西执政后主动要求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俞、李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政策，如释放政治犯，起用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散被广西军阀把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开放和支持工农群众运动等。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让共产党人去改

造军队，掌握兵权，把枪枝弹药发给东兰、凤山、南宁郊区和左江农民武装。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有利于左右两江的武装起义。可以说，左右两江起义，都是共产党与在省掌权的国民党左派建立合作关系之后而组织发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维持封建反动统治，而是对武装起义起过促进作用的政府，不应说它是"各派政治势力相争夺、小军阀割据的极不稳固的政府"。反动政府和进步政府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维护落后的反动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向前发展，后者创造条件准备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俞、李政府显然是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由于事物是矛盾的，是复杂的，俞、李政权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政权。他们不得不应付蒋介石、陈济棠；为了反蒋，也需要联络当时还是反蒋的汪精卫改组派，因而也就用了他们的一些人。但当时在广西，是俞、李和共产党为一方，其他各种反动势力为一方的矛盾，而俞、李和共产党为一方则起决定的主导作用。因此，应该说俞、李政府是进步的政府，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为主导力量的政府。当然，军阀、地主阶级在广西长期掌握各级政权，任何进步的政府，在当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一朝一夕把反动势力扫除干净，但情况在发生变化，就笔者所知，在俞、李主政后，就在吕焕炎驻扎的地区也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如北流县长李智南、北流教育局长黄嘉菊（俞、李反蒋失败后，被捕牺牲）、北流中学校长梁章云、陆川县教育局长吕之汉（后来投靠国民党）、陆川县中学校长庞耀辉（后叛变）等都是共产党员。左右江一带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各部门领导职务的就更多了。

从以上的事实看，俞作柏、李明瑞不应该算作军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俞作柏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左派，他任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时，扶植农民运动，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因而国民党“清党”时，通缉他，查封他的家产，开除他的国民党籍。他去香港后，与共产党仍保持密切关系，他的住所（“俞公馆”）成为共产党人联系、集会的地方，有些共产党员就住在他家。他的胞弟俞作豫，就是国民党“清党”后受到白崇禧的排挤，经李明瑞的鼓励，于1927年到香港在俞作柏住处找到共产党并参加了共产党的。据1987年4月6日《南宁晚报》第三版所载钟陈写的《魂系八桂》一文记述：（1929年）“5月中旬，朱锡昂接到广东省委的紧急通知，前往香港开会，研究举行武装暴动等问题。在港期间，朱锡昂按照党的指示，多次到“俞公馆”与俞作柏商议，决定6月12日（旧历五月初五）在玉林举行端午节暴动，夺取玉林县反动政权”。照此看来，俞作柏与共产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他在国民党“清党”之后，一无军队，二无地盘，显然他们不属军阀之列。

李明瑞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将领，在北伐战争中，战功彪炳。1926年率领部队到达长沙时，湖南共产党组织把姜祖武介绍给他，说明姜祖武的党员身份，希望李明瑞安排姜在部队里工作，他任姜为私人秘书。国民党“清党”之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了新军阀，他们挥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或者把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而李明瑞在白色恐怖中，冒着因“包庇共产党”而丢官的风险，继续保护、重用姜祖武。1929年初又电邀在鄂西暴动失败，被国民党查缉的共产党员童陆生到他的部队工作，并任命他为作战科科长兼团长，他同情共产党，公开对“清党”表示不满，他对桂系军阀黄

绍竑直言不讳地说："自从清党，把政治部解散之后，部队的士气和军风涣散了许多，是个很大的损失。"对黄绍竑排斥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感到气愤。1928年夏在北平广西同乡欢迎会上，李明瑞在演说中慷慨陈词，谴责军阀、土豪、劣绅、土匪等"以民众为可欺，而肆无忌惮"，同时谴责了新军阀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置之不理的卖国投降政策。1928年秋，李明瑞与表兄俞作柏、表弟俞作豫（共产党员）共商先倒桂后反蒋的行动计划。1928年冬他回乡探亲时为怕举事时连累家属，特把妻子、儿女接去上海居住。1929年春，俞作豫受党的派遣，重返李明瑞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李加以庇护。①此时蒋桂战争爆发，李明瑞按原计划在武汉前线突然宣布倒桂，遂使桂系失败。他和俞作柏回桂主政后，作了不少有益于革命的事情。把李明瑞的历史前后连贯地加以考察，可以肯定他在参加和领导武装起义之前，是国民党左派，而不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阀。

或许有人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明瑞参加北伐战争，和俞作柏回桂主政以后，执行联共扶植农工政策，可以不算作军阀，但在"四·一二"政变以后，回桂主政以前，总算是个军阀吧！我认为也不应算作军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清党"，后者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四·一二"以后，一些不坚定的左派已追随蒋介石反共，民族资产阶级也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见《毛选》一卷本603页）而李明瑞他不满"清党"，对黄绍竑排挤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感到气愤，对军阀、土豪劣绅肆无忌惮地欺压人民，予

以公开谴责，继续庇护，重用共产党员，还与共产党人共商倒桂反蒋计划。当时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寥寥可数，只有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而李明瑞能够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俞作柏、李明瑞既然都不是军阀，以他们两人为首脑的政府，就不应称为小军阀割据的政府。

第二，李明瑞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否真诚参加革命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情况。

1929年俞、李回桂执政后，对俞、李政府性质的估计及对俞、李采取什么政策，这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

中共广东省委当时是把俞作柏、李明瑞的政府看作军阀割据的政府的，是把俞、李看作反动军阀的：1929年8月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就认为“广西自黄、白倒台后更为军阀割据的形势”②同年10月的指示信还说，俞、李与李、黄、白的桂系“根本上没有什么不同”。③

当时广东省委对俞、李及俞、李政权性质的估计，来源于中共“六大”的决议。“六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危险敌人之一，”④认为国民党各派“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⑤近几年编写的中共党史的各种版本，都认为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重复二十年代的错误估计。

《关系》一文说：“俞、李在取得广西政权之后，因感自己政权尚未稳固而不得不采取一种表面手段，支持工农，以争取工农对他们的支持，后来当他们的政权稍为稳定后，对农运的支持也无形中停滞了。对于工人运动，虽然名义上准许工人组织工会，实际仍让工贼把持工会，欺骗工人，因而

发生驱逐黄色领袖事情。所以，俞、李支持工农群众运动的措施，虽说客观上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他们还没有投身于革命斗争以前，只是些改良性的欺骗。”

文章又说，俞、李反蒋失败回到南宁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撤退，并准备撤换第四、第五大队的军官，以防止我党把队伍拉走”。

文章最后说：“俞作柏、李明瑞随第五大队到龙州，稍事停留后，俞作柏取道越南去香港，李明瑞没有护照，不能进越南，后在我党教育下，参加武装起义，担任红七、八军总指挥。”

从这些资料看来，俞作柏、李明瑞对工农的支持，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表面手段，只是些改良性的欺骗。他们还想撤换第四、第五大队的军官（多属共产党员）。这就是说他们对工农的支持不是真心的，对共产党是不信任的，也就是说与共产党的合作不是真诚的。李明瑞后来之所以参加革命，是因为没有护照，去不了香港，这就使人感到他是走投无路而被逼上梁山的，对革命原来并无坚定的信念。

李明瑞与共产党的合作是不是真诚的？他参加革命是否具有坚定的信念？

我认为俞、李对工农的支持不是表面手段，也不是改良性的欺骗。俞、李主持的广西省政府把枪枝弹药发给农民武装，这是实实在在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支持。改良主义者只对人民施以小恩小惠，借以欺骗他们，麻痹他们的阶级意识。有哪一个改良主义者把枪杆子交给工农群众让他们去造反的？说俞、李政权较为稳定后，对农运的支持也无形停滞了，也未必是事实。据黎晓沧在《第一个中共广西省委》一文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就是李明瑞面临失败的时候，还吩咐地的经理处长陈镜波把毫银八百元（有一说是大洋）交给右江农运领袖韦拔群同志⑥。至于一些工贼把持工会，可能是工作没有做好，决不是俞、李有意包庇。俞、李回桂不久，忙于军政大事，也没有时间过问工会的具体活动。象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教导总队、南宁公安局、南宁警备司令部这些要害部门，都让共产党去掌握了，难道就不让共产党去改组黄色工会？因此，个别工会被工贼把持，不应据此作出李明瑞与共产党不真诚的论断。

俞、李反蒋失败后，准备撤换第四、第五大队的军官，以防止共产党把队伍带走的说法是否真实，有必要加以探讨。

其他三亲写成的文章有相反的说法：

——黄松坚、姜茂生、蔡力、李滔平写的《缅怀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⑦一文中说："1929年10月中旬，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李明瑞同志，就毅然决然拥护党关于南宁举行革命兵变的行动，并把自己率领的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两个大队交给党指挥。"

——李艺之写的《"虎将"、"名将"——李明瑞》⑧一文中说：俞、李反蒋失败后，"邓小平当机立断，迅速派遣我党掌握的第四、五两个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部分，分别开到左右江地区，和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相结合，作武装起义创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李明瑞支持我党的部署，把两个警备大队交给我党指挥。"

俞作柏、李明瑞的参谋长吕鉴周写的《俞作柏、李明

瑞倒桂反蒋经过》⑨一文中，关于俞、李反蒋失败后回南宁召开军政会议的情况，有如下一段的记述：

……于是俞作柏、李明瑞随即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从新部署，退作长期斗争，所有未附逆部队及总部直属各营，省辖警备第三、第四、第五大队、教导总队统归南宁警备司令部指挥调遣，司令一职由张云逸兼任。所有枪枝弹药，军用物资，悉数运往百色、龙州等地。未几，放弃南宁，所有以上部队开赴百色、龙州集结整理，由李明瑞任总指挥，结合城乡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力量，继续对反革命派作长期武装斗争。

吕鉴周的地位，仅次于俞、李，是会议的参加者，其记事具有较大的真实性。从这段记事看，当时俞、李是信任共产党的，说李明瑞支持共产党的应变部署是有事实根据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资料：——袁任远（曾任红七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在《广西右江的红色风暴》⑩一文中说："十一月初，党中央批准了我们在左右江地区起义的计划，决定建立红七军和红八军，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前委书记和这两个军的政委，李明瑞同志任这两个军的总指挥。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

起义计划（包括军事、领导人的任命）当系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派专人到上海报请中央审批的。那派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同志是什么时候离开南宁的呢？根据当时交通条件和军事变化的情况，当系邓小平、李明瑞等同志撤离南宁之前。此时邓小平同志建议党中央任命李明瑞为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这是有关这两个军的命运的非常严肃郑重的事，决不会轻率重托。如果李明瑞停止支持农民运动，纵容工贼把

持工会，准备撤换第四、第五警备大队的军官，以防止共产党把队伍带走。他怎会建议党中央任命李明瑞为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呢？邓小平同志领导广西党的活动，他和李明瑞接触较多，在俞、李身边的共产党员也会经常向他汇报情况，他对李明瑞的品性，思想倾向了解最全面最深入，只有了解李明瑞是支持而不是阻挠、破坏共产党的应变部署，并深信李明瑞坚决跟共产党革命，充分估计到李明瑞会欣然接受党中央的重托时，他才会建议党中央任命李明瑞为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根据上面的事实和分析，说俞、李准备撤离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军官，以防共产党把队伍带走的说法，可能出于误传或误解。

俞、李主动请求共产党把干部派到广西来，给他们安排重要的合适的工作，保障他们公开地或半公开地活动，不加约束、限制，在人事安排上，经济支援上，凡有所求，无不尽量满足，从不敷衍推托，不两面三刀。应该说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是真诚的。

从国民党左派到共产主义战士，要有一个过程。作为国民党左派，在动机与目的、立场与观点方面与共产主义战士总有一些距离。因此，如《关系》文内所说，在人事安排和军事方面，党向他提出要求时，有时表现犹豫或再三思考，但经党一再说明和坚持，他总是接受党的要求的，这表明他力求按照党的意图办事，也表现了他信赖共产党的真诚态度。

说李明瑞没有护照，不能进越南，是不符合事实的。进越南的护照是谁发给的？是设在龙州的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公

署（处理边政、军事、外交事务的机构）。当时广西全边对汛督办是俞作豫⑪，俞作豫是李明瑞的下属，是姑表兄弟，李明瑞要经越南去香港，俞作豫不会不发给护照。对汛督办公署发的护照，法国驻龙州领事馆照例是签证的。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俞作柏能持对汛督办发的护照进越南，李明瑞当然也不会例外，即使法国领事馆不予签证，他换一个人的名字总可以进去。1930年1月初，李明瑞、俞作豫还拘送所属的思想反动的一名团长何凤川从镇南关（睦南关）出境⑫，那拘送者为什么不可以出境呢？再则镇南关以外关卡，两国边民来往探亲访友，当时根本就不用什么护照，持乡公所发的一张便条就可以通行无阻。因此，李明瑞在1930年2月1日树起红旗以前，他任何时候都可以经越南去香港的，根本不存在没有护照的问题。

根据上面引述吕鉴周的记事，所有部队集结龙州、百色后，仍由李明瑞指挥整理，并继续对反革命派作长期武装斗争，李并没有经越南去香港的打算。至于俞作柏，据袁任远说，他是由党派人护送到香港去的⑬。

李明瑞原来没有当海外寓公的打算，在香港，他没有房子，没有银行存款。我的中学时代的老师陈镜波（曾任李明瑞的经理处长）于1981年间曾对我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人说蒋介石收买了俞作柏、李明瑞，才有李明瑞在前线倒戈事件。其实当时李明瑞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钱。倒桂成功后，他的秘书姜祖武替他活动，从蒋介石那里弄来50万元（大洋）巨款，这笔巨款分给吕焕炎(新近投过来的)20万元，杨腾辉15万元，黄权10万元，他是根据厚疏薄亲，厚人薄己的做人道理来处理的。余下5万元留存经理处作购置军需被服之

用，他自己一分不要。倒蒋失败时，韦拔群来会见他，他问经理处长陈镜波，那5万元还剩下多少，陈镜波说，除了做全师的军服等用途外，只剩下八百多元，李明瑞吩咐陈镜波说："剩下的钱全部交给韦拔群先生。"如果李明瑞有作海外寓公的打算，是可以把几十万元存进香港外国银行的。

李明瑞参加革命是坚定的，是有思想准备的，不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

1928年冬李明瑞返乡探亲时，有一次去探望邻居李晚爹，看见他正在患疟疾，蜷缩在禾草堆取暖，他长叹了一声，马上回家取出自己盖的红绸棉被送给李晚爹，他的夫人不大乐意地说："那我们盖什么？"他说："晚爹辛苦了一世，连床棉被也没有，我们现在上盖下垫怎样过得意？"说得他夫人也感动了，还送10元东毫给晚爹作汤药。事后，他对来访的同族兄弟说："我国农民问题如此严重，非根本改革社会制度不成。"⑭所谓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意味着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废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袁任远对李明瑞的女儿李应芬说："你父亲在北伐时就有进步思想，参加红军是坚定的。"⑮

关于李明瑞参加红军的情况，曾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司令的何家荣（何自坚）在《回忆中国工农红八军》⑯一文中，有一段比较具体的记述：

> 1929年10月中旬末，李明瑞同志欲乘粤、桂军对峙，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际，发动左右两江部队反攻南宁。他命令俞作豫同志率领左江部队（黄德普留守龙州）开进崇善待命。他亲自过右江，拟发动右江部队合攻南宁，但当李将到达百色时，路遇邓小平同志（他布

置百色起义后，拟到龙州布置工作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邓小平同志又和李明瑞转回百色，做李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百色、龙州起义，至时请他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共产党走革命道路。李明瑞同志欣然接受邓小平同志的劝告，毅然走革命的道路，他随即转回龙州”。

袁任远《从百色到湘赣》⑰一文中，也说他和邓小平同志在赴龙州途中，到田东住了一宵，第二天在起程的路上，碰到了李明瑞和许进同志，邓小平和李单独谈了一会，便决定和李明瑞一块返回百色。由此证明何自坚说的当系事实。

上述李艺之的《“虎将”、名将——李明瑞》一文也说：“他（李明瑞）不为蒋介石高官厚禄引诱（据何自坚《回忆工农红八军》一文中说，李明瑞到龙州后，蒋介石曾派唐海安等进行活动，拟委李明瑞为广西省主席兼十五军军长，并愿意接济经费和装备，希望李明瑞反对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但为李明瑞坚决拒绝），欣然接受我党中央的委托，决心打起红旗，参加领导武装暴动。”

袁任远、韦国清、陈漫远、莫文骅、吴西写的《纪念百色起义》⑱一文说：“十一月间，邓小平同志到达龙州，部署武装起义，李明瑞同志毅然同意参加武装起义，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李明瑞与改组派的关系问题。

《关系》一文说：“汪精卫在北方联合阎锡山、冯玉祥

反蒋时，一再电催俞、李反蒋，薛岳也带来了不少港币作诱饵，在南宁坐催俞、李出兵。俞、李终于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暂缓公开反蒋的劝告，而决定接受改组派‘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讨蒋总司令’的任命，同意定期发动倒蒋，兴兵攻粤”。这样的叙述，容易引起读者疑惑：俞、李是不是收受了薛岳的港币？俞、李既然接受改组派"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讨蒋总司令”的任命，那俞、李的军队是不是成了改组派的军队？俞、李是不是成了改组派？如果是的话，那后来在中央苏区红七军政委葛耀山在红七军大抓改组派，说李明瑞是改组派又有什么错呢？后来为什么又给李明瑞平反昭雪呢？

其实，"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讨蒋总司令"不是改组派任命的。所谓改组派有两个组织，一是1928年冬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一是1929年5月成立的“护党革命大同盟”。⑲汪精卫并没有以这两个组织的名义任命什么“总司令”，而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的名义号召各地武装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⑳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他的资格比蒋介石老，原来的职位比蒋介石高。1929年3月蒋介石召开了一手包办的国民党三全大会，处分了汪精卫等人，汪精卫就纠集所有反蒋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会议”的名义与蒋介石对抗。国民党主张“以党治国”，以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的名义任命一些高级军事人员才名正言顺，在任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讨蒋总司令”之前，已分别任命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为革命军第一、二、三集团军总司令㉑，阎、冯等为了反蒋，需要运用汪精卫这块招牌，汪既以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会议名义

委以重任，不便拒绝（但他们公开反蒋时都不采用汪精卫颁发的番号）。如果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或“护党革命大同盟”一派之命，肯定是不予理采的。真正接受汪精卫的“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命令的，是1929年11月中旬李宗仁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黄绍竑就任副总司令，白崇禧就任前敌总指挥，张发奎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㉒但到1930年1月5日这两路军的名义也取消了。

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会议，不是改组派的组织，它的执监委员，除改组派外，还有其他反蒋的各派。因此，说俞、李接受了改组派“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讨蒋总司令”的任命是不确实的。俞、李的军队和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李宗仁的军队一样，都不是改组派的军队，他们本人也都不是改组派。

据俞、李的参谋长吕鉴周说，薛岳在南宁只逗留了五天，临行时，他气愤地对吕鉴周说：“俞作柏用了许多共产党，不得了！不得了！”原来准备补助俞、李军费八十万元港币，分文不给㉓。后来俞、李公开反蒋时，用的是“南路讨蒋军”的番号，而不是所谓改组派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讨蒋总司令”的名称。

俞、李和改组派是有显著区别的。改组派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其主义和政策尽量指责与批评”㉔。俞、李和改组派相反，他们是联共的，对共产党人的活动给予种种便利。俞、李的讨蒋通电是共产党员余惠起草的（只有一句话略作改动）㉕，所提释放政治犯，贯彻三大政策的口号也不是改组派的主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